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危害

王宗华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右倾机会主义曾经多次危害过革命事业；其中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危害最为严重。正因为它危害最严重，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因此，在目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回顾一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是有极其现实的意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对革命的危害是随着其形成和发展而日趋严重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已经形成了。因此，在叙述它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危害时，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它的理论基础。

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五四”以后，他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约在1920年春天，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保留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态度。在他的思想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例如，他在1920年曾经提出所谓“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妄想规定工人应得的红利，以红利作为股本，从而使“工人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同时，希望资本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悟”，以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工业主义进到社会的工业主义。”^①当时他认为：“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②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工人阶级要求改良待迁的觉悟还没有，更谈不上要求政权的觉悟。^③他甚至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的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辮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④由此可见，他对资产阶级存在着何等的幻想，而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又是如何的轻视和蔑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没有

① 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见1920年5月“新青年”7卷6号。

② 陈独秀：“随感录”：“革命与作乱”，见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

③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见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

④ 陈独秀：“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见1921年7月1日“新青年”9卷3号。

党成立后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得到克服。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受到挫折而暂时转入了低潮。他因此而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失去信心，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七”以后不久，他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接着，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三大”以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提出了成套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概括说来，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问题上，陈独秀不承认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又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割裂开来，从而不但抹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质，而且实际上取消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性质。

他认为：“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则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自由。”因为“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尚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①可见在他提出的革命任务中，土地问题只字未提，农民完全被他丢开了，中国革命对内要求只是“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显然，他不承认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抹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质。

不仅如此，他还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对立起来，提出“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的口号。^②看来，他似乎很强调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的墙脚。不推翻地主阶级，不打倒封建势力，就不可能摧毁帝国主义统治的根基。没有农民轰轰烈烈的反封建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打翻封建势力，正是民主革命的真正目标。所以抹杀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把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对立起来，说什么“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表面上似乎很强调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实际上却是取消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

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害怕群众发动起来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承认民主革命的人民性和彻底性。

列宁和共产国际根据东方许多被压迫民族的一般特点，曾经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世纪剥削制度。这个革命实质上就是土地革命。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压迫是最大的压迫。而在这些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被压迫的最广大的群众。同时这些国家又是封建剥削占优势的国家。帝国主义支持着这种封建剥削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要解放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由此可见，陈独秀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性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者。

在“三大”以前所写的文章中，他就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

①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见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

②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见1931年9月10日“布尔什维克”4卷5期。

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①在“三大”的发言中，他竟粗暴地“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脱离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观念’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同时他却“很骄傲地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热烈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权革命的主人。”②

在“三大”之后，为了辩护和宣传他的错误观点，他就以更有“理论”，更多“阶级分析”的姿态出现。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就从他所设想的工人阶级的理想，把他们分为三类，说：“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第二，只有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第三，真正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③他对工人阶级如此之轻视，而对资产阶级却进而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④

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和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中所表现的雄偉力量，熟视无睹；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比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都更老，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广大的事实，一笔抹杀；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般优点和特点，置若罔闻；而不惜倾其全力以贬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反的，对于资产阶级，他却推崇备至，无视它的两面性和它在“五四”以来在革命中所表现的动摇、妥协，而极力夸大它的革命力量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完全可以说，陈独秀是自觉地、有“理论”地放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把它奉送给资产阶级。他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早已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最努力参加民主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⑤革命的成败决定于无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由于无产阶级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有着自己独立的政党，又比资产阶级更愿意使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因此，它完全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领导者。为了使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首先，就要有农民作为同盟者；其次，就要把资产阶级排除于革命领导之外。“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底不稳定性。”⑥

第三，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因此，他始终没有把农民计

①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见1923年4月25日“响导”第22期。

② 同42页注①。

③、④ 同42页注①。

⑤、⑥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见“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

算在革命势力之内。

他說：“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①他虽然也不能不承認“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偉大势力，中国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他同时却認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原因。”只是由于“外貨侵入破坏农业經濟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災流行，官紳魚肉，才有驅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②

由此可見，陈独秀忽視了中国农民所受的沉重的封建剝削和压迫，低估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夸大了他們的缺点，認為他們难以加入革命。因此，他經常忘記了农民，不把农民計算在革命势力之内。在这里，陈独秀也是表現了抹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質的觀點的。他既不承認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当然也就不承認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軍，是无产階級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者，更不了解农民問題是无产階級革命領導权的中心問題。

列宁曾經教导說：“只有在农民羣众加入无产階級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階級才能成为在为民主制奋斗中获得胜利的战士。”^③后来，他在給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指示中，更具体地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必須依靠农民；沒有农民的发动，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无产階級和共产党必須領導农民运动，必須提出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綱領，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联合起来，建立亲密的工农联盟；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創立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府，以保証无产階級实现自己的領導权，把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到底。

第四，在革命統一战綫問題上，陈独秀認為統一战綫是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的妥协，农民不包括在内。在統一战綫中，无产階級不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他說：“中国的經濟現狀，軍閥階級已与資產階級显然分开，而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应当与革命的无产階級妥协，打倒共同的敌对的軍閥階級。……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联合革命的无产階級，实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④在这里，我們看到，陈独秀完全模糊了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的界綫，宣揚階級調和論。在他所規劃的統一战綫中，資產階級居于領導地位，无产階級是附屬的，被联合的对象，而农民則不包括在統一战綫之内。因此，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階級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話！”等等口号；甚至說：

“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組織共产党不迟！”^⑤这就是陈独秀所規定的革命統一战綫的路綫和策略。他不仅自覺地放棄无产階級在統一战綫中的領導地位，放棄无产階級的独立性，甚

① 陈独秀：“中国农民問題”，見1923年7月1日“前鋒”創刊号。

② 同42頁註①。

③ 同43頁註②。

④ 同43頁註③。

⑤ 同42頁註④。

至連共产党組織也可以不要了。这是何等荒謬的主張。

列宁和共产国际曾經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存在两种运动。第一种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企图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二种是工人和农民羣众爭取自身解放的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应当与資產階級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但是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即使支持民族运动，也往往同时与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妥协起来，和他們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階級。因此，无产阶级在与資產階級民主派联盟时，“不要和他們合流起来，必須无条件地保持甚至在最萌芽形式下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无产阶级必須把革命領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革命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鋒队所領導，并团結农民和其他革命羣众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第五，在革命前途問題上，陈独秀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資產階級的胜利，是建立資產階級专政；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急需的集会、結社、罢工等政治自由。

他說：“在普通形式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胜利。”又說：“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許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的这种观点，是同他对革命領導权的錯誤观点相一致的。既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应当由資產階級領導，那么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胜利”了。由此，陈独秀就提出了所謂“二次革命論”。民主革命成功后；既然是建立資產階級专政，无产阶级既然只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那么，自然就只有等待資產階級共和国成立，資本主义发展以后，无产阶级再来实行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推翻資產階級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陈独秀就这样把两个互相衔接的革命阶段割裂开来，在当中横插入一个資產階級专政的时期。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規律，違反馬克思主义的革命轉变論的。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前者为后者准备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陈独秀根本不了解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統一的原則。

早在1905年，列宁就已經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他認為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終結时，就要在无产阶级周圍重新配置力量，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他說：“我們將立即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列宁正是运用了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統一的观点，正确地解决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理論分析，都是違反列宁的指示的，完全錯誤的。他在“三大”前后所提出的这一套机会主义理論，形成了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理論基础。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者正是以这样一套理論指導他們的革命實踐的。因此，这一套机会主义理論实际上也就是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者指導中国革命的总路綫。

●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見“列宁斯大林論中国”。

● 同42頁註。●

●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

二

1924年初，革命統一戰綫正式形成；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地给革命事业带来日益严重的危害，终于使革命遭到了失败。现在我们试从历史上具体地考察一下它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危害，以便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革命統一戰綫建立后，右倾机会主义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这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已形成了它的理论基础。因此，从这个时期一开始，革命事业就受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危害。在統一戰綫工作上，“三大”曾经决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了“三大”这些决定。他们认为既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就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既加入了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就只好采取劳资协调的政策，不必进行阶级斗争；并且应该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的分裂。这种错误的主张妨害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也妨害党本身的工作的开展。只是在这时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其危害尚不大。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批判了这种错误的主张。“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号召全党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独立地位和领导作用，警惕右倾的危险。

虽然“四大”批判了右倾错误，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定，虽然“四大”以后，经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五卅运动，党对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等问题的认识愈来愈加深了，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而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更加严重了。

到1926年初，全国形势已接近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了。在統一戰綫内部，反动派与革命派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紧张起来。国民党老右派反革命分子已经公开分裂出去，组成西山会议派，进行反革命活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也已经发动了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攻的戴季陶主义运动；同时，在广州组织了反苏反共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新右派分子正在加强他们的反动活动。

在这个形势下，1926年1月4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下，给了西山会议派一定的打击。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影响，使党在领导这次大会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主张坚决反对右派，把他们驱逐出广东；并在这次大会上使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联合中央。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新右派是资产阶级代表，一定要把他们留在統一戰綫之内。而且认为在郭松龄失败之后，革命形势在各地都受到了打击，为了保持統一戰綫，必须向右派让步。于是陈独秀和新右派分子进行了妥协谈判，把已被广东革命势力赶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邀回广东参加这次大会，并使他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结果，大会选举的三十六个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七人，国民党左派当选的人数也少于右派和中派。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更占了多数。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能够把国民党中央造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中央，反而使一些右派分子钻进了国民党中央

领导机关，便于他们利用其职位来进行反动活动。在这当中，尤其严重的是把伪装左派的真右派分子蒋介石也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使他后来能利用这个地位窃取大权，从事篡夺革命的阴谋活动。因此，这次大会后，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活动更一天天猖獗起来了。

在这个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彻底地解决了革命实践所面临的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等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和根本路线；并且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可能叛变革命敲起了警钟。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正确的路线和及时的警告。

果然，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篡夺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当时毛泽东等同志正确地指出，不能容忍这次事变，必须反击蒋介石的叛变行为，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联共（布）中央也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①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了这个正确的策略。他们认为这次事变是在戴季陶思想基础上发动起来的，蒋介石就不仅有武装力量，而且有中国整个资产阶级和他在一起，革命力量不能够压倒他，为了使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内，只好执行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于是他们继续退让，听任蒋介石实现了他的阴谋。

不仅如此，事变之后，陈独秀在4月3日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公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②并且声明，共产党决不会采取“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而是支持蒋介石实现全国革命势力统一的。稍后，在陈独秀公开发表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这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所致，并因此而向蒋介石表示“十分抱歉。”^③陈独秀就这样支持蒋介石，为他洗刷罪恶，巩固他的地位。

但是事实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估计的恰好相反。这次事变完全不是什么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而是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广东的革命势力也完全不是不能压倒蒋介石的。当时广东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州有十多万有组织的省港罢工工人，在全省有六十多万农民协会会员和数万农民自卫军。广东革命政权并没有为蒋介石所掌握。革命军队也大都为蒋介石所掌握；在六个军中，第二、四、六军与蒋介石有矛盾，有反蒋的倾向，第三、五军在动摇中，而蒋介石所夺取的第一军中，革命影响还是深厚的。因此，当时在广东革命力量是雄厚的，而蒋介石的势力并不强大。革命势力是能够击败蒋介石的冒险进攻的。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作了可耻的退让。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的进攻实行退让，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经过这次事变，蒋介石把共产党人都驱逐出具有革命传统的第一军，使他为其党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所把持，成为他直接掌握的反动武装。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经过这次事变，蒋介石一方面打

①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② 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见1926年4月3日“响导”第148期。

③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见1926年6月9日“响导”第157期。

击和分化了国民党左派，使一些动摇的左派分子纷纷倒向他，从而削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打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另一方面巩固和加强了他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扩大了新右派的势力，促进了新老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为右派篡夺国民党开辟了道路。事变后，新右派分子更大肆活跃起来，许多老右派分子也乘机回到广东，鑽进国民党各级党部和革命军队中。于是，国民党遭到了变质的严重威胁，革命事业开始伏下了最后被叛卖的危机。

但是这时蒋介石还不敢，也还不愿马上和革命势力公开决裂。因为广东强大的工农革命势力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同时，他也还想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和苏联的援助，以实现他夺取全国权力的野心。于是事变后，他继续玩弄其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伪称事变出于误会，自请处分，并继续公开唱“左”的调子，表示绝不背弃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另一方面却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酝酿篡夺革命的阴谋活动。因此，在事变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整理党务案”。

5月间，新右派分子强使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这个决议案名为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合作，实则是蒋介石限制共产党，篡夺党权的阴谋。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会前党的领导机关对这次会议和这个决议案没有任何准备；开会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毫没有什么争执。”^①结果，经过这次会议，蒋介石以“合法”的形式限制了国民党中革命势力的发展，打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而他自己却取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等重要职位，并使一些右派分子代替共产党人当上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又一次得逞了，他继夺取了第一军之后，又攫取了党权、军权和政权。为了将来夺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他继续施展其两面派手法。

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可是，在这次会议之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扩大右派势力的反动实质，仍毫无认识。他们认为这是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②他们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也仍没有任何警惕。陈独秀甚至断言：“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且由此宣告，谁要倒蒋，谁就是“助长反动势力”，就是“反革命”，就应该被“打倒”，被“枪斃。”^③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既如此退让，又如此卖力地掩护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当然就帮助蒋介石巩固和加强了向革命进攻的阵地，助长了他篡夺革命的更大的野心。而革命潜伏着的危机却更加严重了。

所幸这时党的路线仍然是正确的。广大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仍然是在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导下行动。因此，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高涨，革命形势仍在迅速向前发展。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进一步以革命战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解放全中国。于是，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在1926年7月，正式开始了北伐。在当

① 赵世炎(乐生)：“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见1926年6月9日“响导”第157期。

②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1926年6月9日“响导”157期。

③ 同47页注②。

形势下进行北伐战争是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要求的，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但是陈独秀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发表了“論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贬低北伐战争的意义。他认为北伐“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种軍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①他抹杀了北伐战争的反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他把討伐軍閥与反帝斗争割裂开来，认为北伐“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因而就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

不仅如此，即就討伐北洋軍閥而言，他也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現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吳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助湖南以自卫。”因此，“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禦，……”他把北伐战争看作是“防禦战争”。他看不见广大人民羣众的革命力量和革命运动的高涨，说什么“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軍到来之幻想”。他所看到的只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实力，并由此得出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的結論。他甚至认为北伐只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情，共产党只是以“在野党”的地位来“劝告”和幫助它們。^②

由此可見，陈独秀对北伐战争抱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他不仅低估了北伐战争的意义，而且否認了党对北伐战争的領導。陈独秀这种錯誤态度，一方面影响了党对北伐战争的領導作用更好地發揮；同时实际上幫助了蔣介石实现集軍政大权于一身的軍事独裁。

北伐战争开始后，工农羣众随着迅速高涨起来。陈独秀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的錯誤态度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他既一贯的輕視工农羣众的革命力量，又认为共产党是处在“在野党”的地位，就必然是把自己放在羣众运动之外，而不是放在羣众运动之中。在以前，他就从不积极地去領導和支持革命的羣众运动。在北伐开始时，他站在旁边“劝告”国民政府在北伐时兼顧一下民众利益，但更多的是站在旁边給羣众运动划定界綫，制定清規戒律。到后来，更是指手划脚他批評以至毫无道理的限制羣众运动。最后，甚至与羣众运动对立起来，打击和制止羣众运动。陈独秀既对羣众运动采取了这样錯誤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从羣众运动中吸取力量，使自己坚定起来，反而随着羣众革命运动的高涨而更加动摇起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就随着革命的高涨而向投降主义路綫发展。

陈独秀在1926年7月所写的党的四届三中全会的決議案，以及稍后所写的“我們現在为什么爭斗？”等文章中，进一步發揮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論，并且提出了許多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

在革命領導权問題上，陈独秀仍然強調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承認它是領導者，而且已經在領導着革命运动。他写道：“資產階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現時世界政治环境，中国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参加，必陷于異常困难或至于危險。”“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資產階級已漸成了民族运动中重要成分，且有領導此运动之趋向，特別在上海是如此。”^③他还断言，中国資產階級要在得到了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条約，取消領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等后，才会与帝国主义妥协。

在革命前途問題上，他认为革命的前途有着成功与失敗的两条道路，而成功的道路是“以革命的手段达到民族資本主义的建設。”^④并且說：“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会主义者，

①、② 陈独秀：“論国民政府之北伐”，見1926年7月7日“响导”161期。

③、④ 轉引自胡华主編：“中国革命史講义”158—159頁。

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①显然，他坚持着革命胜利的前途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进一步明确地阐明了他的“二次革命论”。

在革命政权问题上，他公开声明，在民主革命时代，共产党不要政权。他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为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②因此，他当然就不支持工农的政权要求。他反对农民“干涉行政”，主张实行改良的绅权，即所谓以“正绅”代替劣绅。他主张组织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乡村联合战线”；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应带有阶级色彩”。他认为对“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要使他们“中立”起来；而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则由土豪劣绅所把持的旧农会“居调停地位。”^③由此可见，他不仅否认了农民对地主阶级实行革命的专政，而且实际上取消了农民的斗争。

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他认为不可能根本消灭地主土豪劣绅所利用的民团，只能加以改良。对于农民的武装，他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不超出自卫的范围，而且应当是防禦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用自卫军的名义；等等。他害怕农民有了武装会引起与地主民团、驻防军等各方面的冲突，会很容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他既打算根本消灭地主民团，又不信任农民群众，势必要提出这种实际上是取消农民武装的主张。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北伐战争抱着消极的态度，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又是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策略指导他们的实际行动，因此，从北伐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在各方面放棄革命领导权。他们忽视军事工作，不派共产党员到革命军队中去当军官，拒绝在军队中组织秘密的党支部，不进行深入の士兵工作，也不着手改造雇佣兵制度。在北伐军攻占的地方，他们不去着手改造旧的政权机构，建立革命政权。他们也不去领导和推动已经兴起来的和正在兴起来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特别害怕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对于资产阶级，他们仍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一味退让。因此，虽然在北伐战争初期党的路线还是正确的，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仍是按照正确的路线行事的，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妨碍了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1926年11月间，对中国革命的几个根本问题作了英明的及时的指示；并且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进一步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指出：（1）“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将日渐落在无产阶级身上。”^④（2）“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前途。”^⑤（3）无产阶级必须发动农民，掀起农村革命。“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

①、②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斗争？”，见1926年9月25日“响导”172期。

③ 转引自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165—166页。

④、⑤ “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见“中国问题指南”第一册，1937年版。

就愈有力愈强大。”^① 共产党人应该立即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4)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②

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到1927年初，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迅猛地高涨起来。所有各色各样的反动势力也立即起来向农民进行猖狂的进攻，污蔑和破坏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在这个形势下，资产阶级大大地动摇起来。资产阶级右翼为了分裂工农联盟，夺取革命领导权，也极力反对农民运动，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来要挟共产党制止农民的斗争。农民问题成了左右全局的中心问题。形势已经非常紧急。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支持农民群众的斗争，打退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进攻，才能保证自己的革命领导权，制止资产阶级可能发生的叛变，赢得革命的胜利发展。可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表现了严重的动摇。他们被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吓倒，不敢起来支持农民的斗争，反而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他们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坚持“二五减租”的主张，企图限制刚刚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制止农民的土地斗争，以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使资产阶级不致“分裂统一战线”。因此，就在这个革命高涨中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还很低，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利用他们的职权，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压制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他们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变成了党的领导路线。于是，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样一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就更加严重、更加广泛了。

在这农民运动受到严重危害，革命将被断送的紧要关头，与陈独秀相反，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坚定地热情地支持了农民的斗争。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同志深入湖南农村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力为农民群众撑腰。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满怀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正义斗争。他说：“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夸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③ 他主张坚决地支持农民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要求。他认为农村正在掀起的革命热潮正是革命所需要的。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在农村中，贫农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因此必须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反对一切咒骂贫农的反动言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与陈独秀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甚至不让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坚持继续执行他们的投降主义路线。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底国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革命阵营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加尖锐了。蒋介石一方面加紧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积极寻找帝国主义者及其他一切反动派的合作。帝国主义者正企图从革命阵营内部

①、②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

③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

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从内部来破坏中国革命。于是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彼此勾结起来，蒋介石也就胆敢公开向革命发动进攻了。

1927年3月，蒋介石就在赣州、南昌、九江等地制造反共反革命暴行，屠杀工农和革命人士。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些限制蒋介石新右派活动的决议。但是这时蒋介石实际上已不再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了，他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可是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党没有根据这个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这时对蒋介石斗争的策略仍没有超出控制他的范围，因而国民党三中全会并没有撤销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更没有惩罚他的反动罪行。于是蒋介石更肆无忌惮地向革命进攻了。继南昌事件之后，蒋介石又制造了安庆、蕪湖的暴行，并在3月26日赶到上海布置反革命政变。

当时上海已由工人武装起义解放了，南京也被第六军和第二军占领，上海的革命形势正在空前地高涨。上海工人在起义中夺得了大批武装，利用这些武装，原可建立起万人以上的工人武装队伍。但是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只编成了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甚至只留用了1700多支步枪。起义胜利后，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召开了市民大会，选举了市政府委员。但是因为陈独秀只注意拉拢不愿意参加政府工作的少数资产阶级委员，以致政府工作陷于停顿，革命政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与帝国主义者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勾结起来，帝国主义者增兵上海，并会同买办阶级给予蒋介石大量经济援助，收买和支持他镇压革命。蒋介石于是加紧布置反革命政变。他以欺骗手段麻痹上海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同时调走和打击南京及杭州的革命势力，使上海革命势力孤立起来。接着，他组织帮会头子和流氓成立反动团体；指使国民党反动分子制造反共舆论；并与刚回国的汪精卫成立反共协议。

在这个严重的关头，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毫不觉察，竟在4月5日与汪精卫一道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竭力为蒋介石辩护。宣言中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不可解析。”因此要求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陈独秀就这样为蒋介石反动派所利用，帮他们散布了进攻前的烟幕，从而麻痹了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警惕性，解除了他们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

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既如此软弱，如此恭顺，如此退让，蒋介石更无所顾忌了。他调走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以收编的军阀部队接防上海；下令一切工人纠察队和工会均归总司令部管辖；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总工会；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篡夺上海人民政权；取缔总政治部；公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这一切毫无阻挠地布置就绪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广州，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惨杀。与此同时，凡蒋介石统治地区都疯狂地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工人

●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

領袖和革命人民英勇地牺牲了。中国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失敗。

当蒋介石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还是在革命势力控制之下的，革命势力是强大的。上海八十万工人在总工会领导下組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他們曾以武装起义打敗了有帝国主义直接配合和支持的直魯联軍，解放了上海。上海广大的城市貧民和小資产階級都是拥护革命，同情工人階級的。在上海外圍，南京駐有共产党人参加領導的第二軍和第六軍，杭州的革命势力也不弱。而蒋介石在上海的势力并不大。他所直接指揮的駐在上海的北伐軍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受过革命影响，也同情工人，表示不愿意开枪打工人。后来蒋介石不得不把它調走，另調来新从孙傳芳軍閥軍隊归領的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他用以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主要也就是这支部队和几百名僱用的流氓。与上海的情况相似，广州的革命势力也是强大的。广州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各一万多人，組織起来的工人18万人，近郊农民协会会员近百万人，还有深受革命影响，表示愿意和工农一道斗争的黃埔軍校入伍生6000多人，而反动派当时所掌握的實力只有一个师的軍隊。因此，如果不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一貫退讓，听任蒋介石反动派完成其反革命政变的布置，而是对資产階級的叛变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断地聚积和扩大革命力量，領導工人階級随时准备着鎮压資产階級的叛变，那么工人階級是决不致遭到这样惨重的失敗的。由此可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革命遭到严重挫折，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綫起了主要的作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紧急阶段。这时，陈独秀不但沒有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訓而有所觉悟，而且在这革命遭到挫折的严重關头，进一步发展他的投降主义路綫。在4月末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为右傾机会主义錯誤辯解。他認為“中山艦事件”中主張退讓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革命力量不能压倒蒋介石，而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他的反革命面目。同时他却認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冒險主义錯誤行为，因为无产階級只能进行經濟斗争，根本不应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

对于当前革命的主要任务，他錯誤地把繼續北伐以扩大革命与沒收分配土地以加深革命对立起来。他認為在張作霖、蒋介石沒有被打倒的时候，只能扩大革命，如果加深革命，势必妨碍扩大革命，只有待扩大革命之后，才能加深革命。这种「扩大革命論」实际上是取消了目前革命的中心内容——土地革命，从而势必使扩大革命成为不可能；扩大了，也不能巩固。

陈独秀还提出了他的“到西北去”的理論。他認為在上海、广州、汉口及其他工业地区，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的力量强大，革命不能发展，而西北地区則帝国主义影响比較薄弱，又接近苏联，革命就容易发展起来。因此，革命应当退出东南各省，“到西北去”。这个理論表現了陈独秀十足的悲觀失望情緒，也表現了他不要革命羣众，拋棄革命羣众的可恥思想；其实际結果必然是断送革命而幫助蒋介石反动派巩固他們在东南各省的統治，并且进而把华中一帶也奉送給他們。

陈独秀既一貫不承認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經常忘記了农民，現在对当前的革命任务和革命形势又存在着上述投降主义的和理論，当然就不可能对当时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农民的土地問題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在大会討論土地問題时，他主張所謂「土地的政治沒收」，即只沒收反革命分子、反动軍官和有重大民憤的劣紳的土地。这实际上是不解决农民的土地問題。大会虽然沒有接受他的主張，但在他的影响下，否決了毛

澤东同志提出的普遍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議，而通过了一个不沒收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的不彻底的土地決議案，并且沒有規定实行的办法。

在这次大会上，許多同志批判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錯誤，駁斥了他的「扩大革命論」和“到西北去”的理論。但是由于党还在幼年时期，全党理論水水不高，由于陈独秀家长制的領導作风，压制批評，也由于当时共产国际駐中国的代表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陈独秀的錯誤路綫，大会沒有能明确地指出陈独秀的錯誤是路綫性質的的錯誤，也沒有制定糾正錯誤的具体政策。而且在陈独秀口头上表示接受批評后，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員并繼續由他担任党的总書記。因此，大会对投降主义路綫的斗争沒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大会以后，陈独秀仍然坚持貫徹投降主义路綫。

这时，工农羣众运动仍在繼續高漲，武汉的北伐軍也已出师河南繼續北伐，但是反革命势力也加紧了对武汉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并在革命內部制造叛变和暴乱。于是夏斗寅叛变和馬日事变相繼发生。武汉的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在这个形势下，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傾向迅速增长起来，开始由动摇走上叛变的道路。

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會議通过了「中国問題決議案」，并且在馬日事变前后，先后发出了两个關於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指出了挽救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陈独秀拒絕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讓党内許多同志知道，甚至撕毀青年团中央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決議案。他坚持执行投降主义的路綫和策略；在当时几个關係革命成敗的最重要的問題上，都完全違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土地革命与工农运动上，共产国际指出，为了战胜目前的困难，必須发动广大劳动羣众加入斗争，而“要想引导羣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行土地革命，在城市滿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要求，才有可能。……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綫，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①“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不應該脫离工农运动，而應該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則就会把事业断送。”^②在农村中，必須提出“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口号。^③“在城市中，必須設法提高工人羣众的物質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厂內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一切工农羣众組織須有各方面的加强与扩大之必要……”^④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五大”通过的不彻底的土地綱領也認為暫時只能宣傳，不能实行。他們承認貧农的行为“幼稚”、“过火”；贊成解散黃岡县农民协会；命令新聞記者党团员写文章批評农民运动；并由中央宣傳部出通告，由共产党员領導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出布告，糾正正沒收土地等“过火”行为。如6月14日中央宣傳部的通知說：“放任农民无組織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問題已經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須糾正。”^⑤他們也同意武汉国民党限制罢工，实行强制仲裁等等

① “中国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通过）。見“中国問題指南”第一冊，1937年版。

② 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31頁。

③ 同上書第30頁。

④ 同50頁註②。

⑤ 轉引自“中共‘八七’會議告全党黨員書”，見“中国問題指南”第二冊，1937年版。

限制工人运动的措施，并且制止工人接管工厂主故意关闭的工厂，不准封闭店东故意抬高物价的商店，甚至不许工人逮捕反革命分子。

在武装工农问题上，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大胆、坚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①“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②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仍然信任一些反动将领，不去武装工农，甚至自动解除工农武装。当夏斗寅叛变时，武汉政府为形势所迫，答应发给工人纠察队二千支枪和几千元月费。陈独秀却拒绝接受。在马日事变后，湖南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完全有把握攻下长沙，消灭许光祥叛军。陈独秀却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认为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随后他又命令汉口工人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把武器交给公安局；甚至把童子团的木棒也解除了。

在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关系上，共产国际指出：“在目前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它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③“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领袖们坚定起来，或者把他们变成废物。……”^④并且指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之政策之正确路线。”^⑤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不但不去改造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而且实际上完全取消了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放弃自己的独立政策。他们在5月间中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⑥显然，在他们看来，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互相冲突的；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能从党的“最大要求”出发，即不适用党的纲领、策略和一般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只有放弃自己的“最大要求，才能使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才能团结国民党左派。他们甚至说，现在须要与国民党联合，就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独立。他们既然采取这样迁就、投降的路线，当然对国民党的动摇，不会有任何批评。不仅如此，他们命令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听国民党的命令和指导，按照国民党的决议的精神去工作，不得有独立的主张，不得使这些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更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他们甚至同意解散由共产党员主持而“过左倾”的黄冈县国民党党部。对于武汉政府，他们没有革命的建

① 同54页注①。

② 同54页注②。

③ 同54页注③。

④ 同54页注④。

⑤ 同54页注⑤。

⑥ 同54页注⑥。

共產黨員領導的農政部和勞工部沒有公布一個減輕工农痛苦的法律。農政部甚至發布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的“妄動”，違反則“嚴罰”。在地方政權上，他們命令共產黨員退出湖北省政府，並且主張各處地方政府必須尊重國民政府之最高權。

陳獨秀投降主義者執行與共產國際指示完全相反的投降主義路線，企圖以妥協、投降求得團結，保持與國民黨的聯合。但是這不但不能使已經走上叛變道路的汪精衛等集團回轉頭來，而且更加強了他們公開叛變的決心。局勢愈來愈危險了，汪精衛集團的公開叛變已經迫在眉睫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者還以為他們退讓得不够，又在6月底至7月初的中央會議上通過了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決議。

這個集投降主義之大成的決議，包括以下幾點主要內容：（1）承認國民黨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說“中國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2）承認政權屬於國民黨，說“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國民黨員的資格參加，不是以共產黨員資格參加；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共同負責，而不是兩黨公開執行形式，這件事多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3）承認“工农等民眾團體均應愛國民黨黨之領導與監督，工农等民眾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布法令。”並且限制以至禁止工农的鬥爭活動，規定“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戴高帽子等事。”“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4）規定“工农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祇因避免政局之糾紛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

從這個決議的內容，我們看到，它是投降主義者十分可恥的全面投降的綱領。它助長了汪精衛集團的反動氣焰，推動了他們實行公開的叛變。在他們已在公開的準備叛變的情況下，7月13日黨遵照共產國際電令，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黨員退出政府，同時發表對政局宣言，斥責國民黨反共反革命的罪行。但是到了這時，陳獨秀投降主義者仍對國民黨存在着幻想，在宣言中表示不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希望國民黨指導機關及國民政府實行革命政策。但這只是他們的幻想。7月15日，汪精衛集團舉行「分共會議」，正式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歸於失敗了。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關係發生了大變化。在反革命方面有兩支主要勢力。一支是在「安國軍」名義下聯合起來的舊軍閥勢力，包括張作霖、張宗昌、閻錫山的軍隊以及吳佩孚、孫傳芳的殘部，其中以奉軍為主，擁有26萬人，其餘共約13萬人。他們佔據着北方大部分地區及蘇、皖兩省北部。但是他們內部矛盾多，軍隊的戰鬥力也薄弱。另一支是蔣介石反動派的勢力。他們據有閩、浙兩省和蘇皖兩省的江南部分；並得到廣東、廣西和四川軍閥的策應。蔣介石有軍隊約12萬人，以第一軍、第七軍為主，其餘多是收編的舊軍閥殘部，戰鬥力弱，而且彼此矛盾多。廣東、廣西軍閥部隊很少。四川軍閥部隊約有12萬人，但分屬於幾個互相敵視的派系。這兩支勢力本質上都是反革命反人民

的。他們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很大的，当时正隔江对峙着，到五月間就打起来了。在革命方面，这时革命势力仍保有湘、鄂、贛三省，拥有国民革命軍超过10万人，其中包括第二、三、四、六等軍及賀龙的第15独立师、叶挺的第24师。另有馮玉祥的国民軍約7—8万人，已占領了陝西、甘肃、河南西部及綏远南部等地。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革命方面有共产党、青年团和广大的工农革命势力。革命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有着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軍隊的数量虽不及反革命軍隊，但在道义上和作战能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反革命軍隊。不过革命势力是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的不利条件下。

在当时这样的形势下，蔣介石一时无力对革命組織全面的进攻，只能以經濟封鎖和唆使革命內部动摇分子叛变为其进攻的主要方式。張作霖、吳佩孚和四川軍閥楊森对革命发动了进攻，但随后都被革命軍隊所打败。到6月初，郑州、开封都被革命軍隊佔領了。

从上述形势看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革命势力是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削弱了。在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上，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但是反革命势力并未取得絕對的优势，它們有着許多不利的因素；革命力量虽然弱小，并处在不利的条件下，但并非居于絕對的劣势，它仍有許多有利的因素。

在这个情况下，革命的主观指导就起着重大的作用。主观指导正确就能逐漸变劣势为优势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主观指导錯誤則革命势必失敗。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如果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接受毛澤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見，依靠羣众，广泛发动工农羣众运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坚决鎮压一切叛变阴谋，那么，敌人的軍事包围是可以打破的，經濟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劣势是能逐漸轉变为优势的。虽然革命不能立即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但是可能逐步取得胜利，而决不致于遭受这样惨重的失敗的。不幸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却执行了上述严重的投降主义路綫，以致革命归于失敗。

从上述历史上考察，我們看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危害貫串了整个历史时期，而且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愈来愈严重的。同时，我們也看到，在这个时期，党内始終存在着两条路綫——共产国际和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主义路綫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綫的斗争。在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綫是正确的，因而革命迅速高漲起来，并且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偉大胜利。但是当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就已經給革命帶來了危害，造成了潜伏着的严重危机。到了这个时期的后期，約半年時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綫，在党的领导机关佔了統治地位，于是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襲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敗了。

誠然这次革命的最后失敗是有其客观的原因的，那就是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但是即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革命势力終究还只是相对的优势，这只是使革命有更多的失敗的可能，并不决定革命非失敗不可，当时仍然同时存在着挽救革命的可能的。正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綫断送了挽救革命的可能，使革命失敗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綫是这次革命失敗的主观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內的机会主义路綫，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結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紳买办階級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

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

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严重危害，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第一、为了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高度的革命积极性，还需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指导革命；还需要善于对各种各样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

从上述史实，我们看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尽管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革命仍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到了它的后期，由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指导路线，虽然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了，仍不免遭到严重的失败。

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广泛发动工农群众运动；进行革命战争；开展土地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中国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妥协，农民不包括在内；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不要革命的群众运动；取消工农武装；制止土地革命；……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在党内的反映。它只有利于反动派，不利于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也不利于民族资产阶级。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除了毛泽东等少数同志外，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高，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也还不善于对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因此，虽然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有着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对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许多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革命仍不免失败。历史昭示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又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革命，同时还要对一切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一直到完全克服它。

在这个时期以后的革命过程中，中国革命实践曾经提出过许多新的问题，面临过许多严重的危难，出现过多次「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吸取历史的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解决了所有新的问题，渡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一切机会主义，正确地引导了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有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

●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

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为此，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从上述历史上，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革命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这种区别在革命形势大变化的低潮或高潮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仍然满怀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坚定不移地领导着湖南的工人运动；而陈独秀却因此完全丧失了对工人运动的信心，怀疑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贬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而高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热情洋溢地歌颂农民的行动，全力支持他们的斗争。而陈独秀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叫嚷农民运动“过火”、“幼稚”、“糟得很”，力图阻止农民的斗争。为什么他们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而且在革命低潮或革命高潮时更表现得如此明显呢？这绝不是偶然的。

“怎样对待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充满热情，同群众共呼吸，采取积极支持和积极领导的态度，去鼓舞他们前进呢？还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或者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去反对他们呢？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根本区别。”^①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业；革命需要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在革命中，他们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道，同艰苦、共患难，一起生活，一同战斗。无论在胜利中或在危难里，他们都与群众血肉相连，始终紧密地坚定地依靠群众，信任群众，置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即使群众运动出现了一点难以避免的偏差，他们决不因此埋怨群众，更不会因此否定群众的斗争，而是积极地引导和帮助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地前进。而资产阶级革命者则相反。当他们还要求革命的时候，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利用群众进行革命。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一旦感觉到革命的群众运动超过了他们阶级利益所容许的范围，越过了他们所能控制的限度，他们立即就回过头来咒骂、限制以至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由此可见，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实际上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其所以在革命低潮和高潮时期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就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敌人进攻更猖狂，阶级斗争更尖锐，没有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人必然要动摇起来。而这种动摇首先就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所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正是他们立场动摇的表现，正是表明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他们对工农运动的责难和限制，实际上是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身份，执行着资产阶级向革命进攻的任务。

由此可见，历史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应当有正确的态度，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毫不动摇地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投身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为此就必须具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在革命形势变化的关头，难免要立场动摇，滚入资产阶级的泥坑中去。如不及时回头，坚持错误，还难免要堕落成为反革命，象陈独秀一样。

1959年9月

① 周恩来：“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